



□ 张晓剑 张延华

临猗(猗氏)古称郇阳,这大约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为什么称郇阳,什么时候称郇阳,本文想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对郇阳作一番初步考释,以期抛砖引玉,与专家学者共同探究郇阳的历史渊源。

西周为郇伯封地

查《辞海》,郇,古国名。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此,在今山西临猗。春秋时为晋地。据康熙《猗氏县志》载:“考猗氏本属禹贡冀州之域。其在唐虞夏商皆为甸服,在周为郇伯国。郇伯,文王第十五子(一说为十七子)也。为州伯,治诸侯有功。”《春秋传》曰:“毕原丰郇,文之昭也。”这说明,在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文王第十五子(或十七子)被封为郇伯。郇伯因治理诸侯王有功而成为诸侯之首,名震四海。故《诗经·国风·下泉》有“藜藜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的颂辞。

猗氏古称郇瑕

唐代诗圣杜甫《哭韦大夫之晋》诗中有“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之句,《奉酬寇十四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中又有“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之句。查《辞海》,瑕,古地名,春秋晋邑。在今山西临猗西南。与郇,古国名的解释相比较,至少可以清楚地说明,郇瑕一为国名,一为城邑名。郇瑕连用实际上代表的是一国一邑的区域。元代诗人王思诚《过郇城》有“世传今猗顿,本属古令狐。四境村墟辟,千年壁垒孤。郇瑕宣抚地,秦晋战争区。对泽空城在,桑泉古邑芜。牛羊多茁壮,田亩亦丰腴”的描述。这说明郇瑕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丰饶富裕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鲁僖公二十四年》:“二月,秦伯使公子挚如晋师,退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郇瑕地沃饶近

盐。又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成公六年,即公元前585年,晋国晋景公在故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迁都会议。会议上诸大夫几乎异口同声说,郇瑕之地丰腴富饶,又靠近盐池。要迁都非郇瑕不可。只有韩献子(韩厥)力排众议认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晋景公听从了韩献子的意见,于“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要不是韩厥的一番话,历史地理当大大改写,临猗当如今日侯马般热闹繁华!

郇城、古猗氏城究在何处?

猗氏一带为郇瑕之地,大概没有什么异议。但郇城在哪里,瑕城又在何处,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少人认为牛杜铁匠营一带古城址就是古郇城。其实,这是与古猗氏城的混淆。查《辞海》,猗氏:1.古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南。有盐池。战国时,鲁国猗顿在此以盐致富。一说在此经营畜牧致富。2.旧县名。西汉置,在今山西临猗南,晋魏间移于今临猗县,西魏改为桑泉,北周复旧名。1954年与临晋县合并为临猗县。《辞海》的解释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古猗氏在现临猗南边,离盐池较近。酈道元《水经注》云:“河东盐池谓之解盐。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在猗氏古城南。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说: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这些都充分说明古猗氏包括地域非常广阔,盐池也属其领地。《春秋》杜预注:猗氏有盐池。后分猗氏、安邑治县以守之。二是猗氏是在晋魏间才移到今址的。那么,古猗氏又究竟在哪里呢?据酈道元《水经注》记载:“涑水又西经猗氏县故城北。”牛杜铁匠营城址正在涑水河南岸,而绝不是今猗氏城在涑水河北岸。酈道元(470—527年)生活在北魏时期,也正好是猗氏城迁址不久,他本人又好学博览,并亲自到各地“访读搜渠”,留心考察水道变迁和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所以

说他的注释是比较可信的。

那么,古郇城又在哪儿呢?据《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资料记载,古郇城在今临猗(猗氏)县城西南四里。以地势分析当在关原头西北一带。《左传·桓公九年》及《竹书纪年》均有记载:“晋武公灭郇以赐大夫原,是为原叔。”这说明郇国延续了四百余年,于桓公九年即公元前688年灭亡。该城便成了大夫原的封地。现在此地虽无城可考,但三个原头村。这个原头的“原”字,是否与大夫原有关呢?没有可靠的文字资料,不可武断,只能做些推测。据关原头一村老讲,他小时候曾见过一幢石碑,碑文记载关家是从金大定(1161-1188年)年间迁移至此定居的,此前该村叫东原头,那么杨原头该为西原头,阎原头该为南原头了。这至少可以说明原头村名来源很早。或者说,三个原头村正是在原叔接管郇城后,为防御起见在废墟上建起的三个戍所。如果这种推测不错的话,那就可以作为郇城就在此地的旁证。从该地地层观察分析,古郇城应该已经被两千多年来从峨嵋岭上流下的坡水夹带泥沙埋藏在三四米深的地下了。据说关原头村民在村西头打井时,曾在四米深处发现瓦砾,化肥厂扩建尿素工程时也在七八米深处发现瓦砾。这是否又可作为两条佐证呢?但如果要真正确定郇城的确切位置、大小、建筑特点等等,只有期待运用科学的考古方法,作进一步挖掘、探测、考证了。

程村东周墓的发掘也许能揭开瑕城之谜

瑕城又在什么地方?自古无人能够说清楚。按酈道元《水经注》解释,“涑水又西经解县故城南”“涑水又西南经瑕城”。据笔者多年前写的《解城考》一文,故解城应当就是城东城西之间的古城遗址。那么,瑕城当在城西西南某地。程村东周墓的发现也许会给我们揭开谜底。程村位于峨嵋岭南,涑水河西岸,隶属山西临猗县庙上乡,在县城西22公里处。据初步调查,它是一处面积逾万平方米的墓地。在村西有一当地群众使用的取土场,约5000平方米,俗称“土塘”。1987年夏,当地群众在土塘取土时发现了墓葬。同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运城行署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

对程村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工作延续了二年,共发掘土塘及其周围东周时期的墓葬52座、车马坑8座,共出土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1500余件,成为轰动全国的考古大发现。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发掘工作只做了很小一部分。如果能够进一步发掘,当会揭开更多的历史谜底。一般说来,大型墓葬多与城址相距不会太远。也许古瑕城就在程村一带。我们期待着科学的考古会给我们揭开瑕城之谜。

猗氏何以称郇阳

郇、郇城、郇瑕问题搞清楚了,但何以又变成了郇阳呢?这个问题笔者查不出史料说明,只好做一些臆测推断。我们的老祖先们在拟定或者在约定俗成某地地名时,往往会依据该地所据山水南北方位而定阴阳。查《辞海》,阴,山的北面或水的南面。如华阴、江阴、淮阴。阳,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我们不妨搬出中国地图,称阳的城市多极了。如果不是在山之南,肯定是在水之北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郇城所处的方位,她不仅据于峨嵋岭南,而且据于涑水河的北面,可以说是阳中之阳了,称为郇阳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称阳反倒奇怪了!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主观臆断,有待进一步考证了。

郇阳最晚当起于明万历年间

有人说,郇阳起于清代,这未免有些轻率。只要读一读中华楹联巨匠乔应甲的对联专著《半九亭集》就会有所发现,乔应甲的诗联中都有郇阳的提法。

夏邑童生事;

郇阳署印官。

传言家乡苦旱又接报见中使去解州卖余盐
赋此

传闻旱魃苦郇阳,忽报貂珣下解梁。

市肆已闻惊榷税,鹾池还见走豺狼。

群奸到处张威焰,百姓无人不悚惶。

回首乡关空洒泪,此情何日达君王。

乔应甲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任推

(下转14页)

书局点校本,1975年。

[9]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第1期,第46~49页。

[10]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

[11]E.Charancs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3年。

[12]安新英《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第4~15页。

[13]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7~118页。

[14]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第111~116页。

[15]Gui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1981.

[16]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0~42页。

[17]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2~185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东京国立博物馆等《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

[20]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

1978年第2期,第111~116页。

[21]I Art De l'Asie Centrale,图版196.Editions d'An Aurora Leningrad 1988,Publication en France,Aurore' Editions d'art Ars M unclipne' et Relie en Finlande.

[22][日]江上波夫监修,日本东方博物馆、朝日新闻编集《南俄罗斯骑马民族遗宝展》图录,朝日新闻发行,1991年。

[23]林英《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艺术史研究》,第3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1~437页。

[24]V.I.Sariancli著,加藤九祚译《丝绸之路的黄金遗宝——西伯尔甘王墓发掘记》(日文版),岩波书店,1988年。

[25]韩伟编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线图120、203、206。

[26][日]江上波夫监修,日本东方博物馆、朝日新闻编集《南俄罗斯骑马民族遗宝展》图录,朝日新闻发行,1991年。

[2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林格尔县南园子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19~524页。

(作者系大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上接20页)

官,到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间两次以推官署襄阳府、鄢阳府台印,即代理知府。所以自称“鄢阳署印官”。乔应甲于万历二十七年以治行优等被征召入京升迁,却因不送礼而惹恼当权者而在京城候旨三年。这期间,恰好碰上家乡大旱与太监陈增陈奉等以矿税特使身份到全国各地大肆

掠取豪夺,横行霸道,搞得民不聊生之时,乔应甲满腔激愤,奋笔疾书,写下了这首律诗,倾吐了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一腔热血。

由此可证,最晚在明万历年间,鄢阳一词就已经通用了。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临猗县博物馆)